

走出艾滋村

21
世
纪
中
国
民
间
档
案

人物档案

熊长东

男，1985年生，出身于河南省上蔡县五龙乡熊桥村；

家庭成员：父亲、母亲、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三；

2002年，曾卖血养家的父亲在外出打工时得病，后被查出艾滋病；

2003年，也曾卖血的哥哥被查出艾滋病，他的家因此成为艾滋家庭；

2003年，高考，被河南农业大学录取，因家境贫困而放弃；

2004年，第二次高考，被哈尔滨商业大学录取。



一家三口并无沉重压抑的心情

他生活在一个艾滋病肆虐的村庄，父母的血维系着他一个大学的梦、一个艾滋家庭的希望、一片废墟中孕育的未来。

2004年8月6日，按照一份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新长城”特困助学金申请表上的地址，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上蔡县五龙乡熊桥村，找到了我们的拍摄对象——熊长东。

在全国扶贫基金会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特困大学生的申请表格当中，我们发现了熊长东这个学生，他来自河南上蔡县的艾滋村，而家中的顶梁柱——他的父亲在几年前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一时间，他的大学梦想在这

样的地点、这样的时刻就显得是那么的奢侈和不切实际。熊长东在“新长城”特困助学金申请书上这样写着：“20年以前的土坯房 我们现在还在住着，屋顶翻新了一次又一次，每次下雨，我和爸爸就拿一块大塑料布爬上房子去补窟窿，但往往还是外面大雨，屋里小雨，那根大梁在大雨当中也劈了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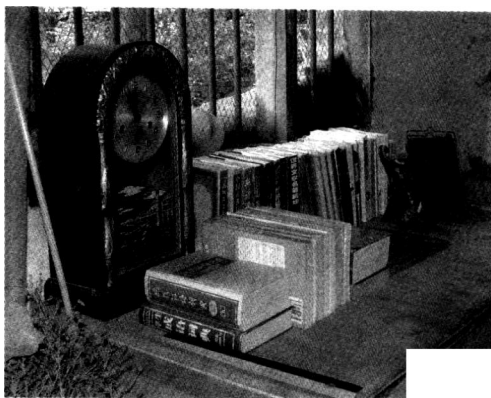
祸从天降

〔采访两天前〕两天前的深夜，突然下起了一场大雨，熊长东家修补了无数次到处漏雨不堪重负的屋顶不断发出异样的响声，熊长东感觉不对，赶紧拉着父母往屋外跑，三个人刚刚跑出屋子，他们住了已经 20 年的老屋的屋顶就塌了。



20 年的老屋虽然修补了无数次还是倒塌了

熊长东 小时候 我们家人多地少。三个半大的孩子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于是父母便跟着人家东奔西跑去卖血，上驻马店、西平等地，用那微薄的卖血钱来供我们吃穿和上学，有时一天竟能卖两三针。现在看到父母胳膊上成堆的针眼，我就感到痛苦、内疚，好像那一根根针就扎在我的心里。



熊长东的书桌是屋内最整齐的角落

大概有一次，家里实在没有钱了，因为又需要交学费嘛，所以，我爸和我妈就卖血了，回来之后，替我交的学费，好像每一次（学费）都是这样来的。

看着自己父母的血汗钱来供自己上学，有时候每到交学费的时候，回来看到家里的情况，就不好去（开口）说，好像对学校吧能拖就拖。

熊父：因为他们几个都在上学，经济上比较拮据，反正这个村庄地方比较偏僻，其他也没啥收入，所以农村就兴起卖血的环境，所以就参加了卖血这个行列，开始要（交）学费了，那就先去卖点血，先去交学费，那个情况是很现实的。

熊长东：我爸2002年秋季去外地给人家打工时，感冒发烧一直不退，但他仍不愿回家，因为家中处处都需要钱，尤其是我这个伸

着嘴等着饭吃的学生。他自己强忍着干活，晚上才熬些药，直到无法再撑下去了，才被迫无奈地回来，一回来就被诊断为艾滋病！

他从外面打工回来之后，因为我们这儿已经有发现的了，所以看见他的病情好像跟别人的很相似，所以推敲着可能也就是这种病吧，家里人就让他去县医院检查检查，开始他不愿意去，毕竟这种病（刚）出来那段时间好像受人歧视，到最后看见别人都去了，他就去了。

陈晓楠：后来是谁最先拿到那个化验单呢？

最初，拿到确诊父亲患病的化验单的是熊长东的大哥。一段时间内，他们害怕父亲接受不了，给他弄了一份假化验单，而没有告诉他真相。但是，父亲处于半信半疑之间，其实他早已猜出了自己的病情。

母亲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家里人背着父亲情不自禁地流泪，毕竟父亲是家庭的支柱。

陈晓楠：你记得第一次把这个话说开了是在什么时候？

熊长东：好像到现在一直没有说开，他自己就知道。

陈晓楠：等于是默认了？

熊长东：嗯。

陈晓楠：你自己刚知道得病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熊父：刚知道得这个病的时候压力很大，考虑到这个家庭，你得了这个病，你一个男人在外面各方面搞一些经济来支持家庭的开支，资助小孩上学，钱可以用在哪里，对不对？现在你要到哪个地

方，病一严重，你又得花钱，考虑（到病）治不好，你压力不大吗？首先压力大得很。

陈晓楠：你心里这些话、这些压力、发愁的地方你会跟儿子说吗？

熊父：不能跟他说。当父母的，你自己的心情不应该跟小孩讲。你本身有压力，你再跟他们讲，对小孩产生各方面（影响），他也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这是肯定的。你的思想压力，一切苦痛都在你自己心里，你（应该）自己承担。有的东西不必要跟他们说的，你跟他说（了），会起副作用，对不对？

父亲的病使原本开朗的熊长东变得沉默寡言，在老师、同学面



接受采访的熊长东

前他感到自卑，感到压抑，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熊长东说父亲的病，是埋藏在他心里的秘密，他不愿意让老师和同学知道，那时，他最怕的就是听到周围的同学说到“艾滋病”这三个字。

这会不会让熊长东在学校感到特别沉重呢？毕竟，他需要隐瞒这个秘密，唯恐别人知道。

熊长东：我在学校，确实不能跟别人说这种病，（艾滋病）很受歧视的。如果说了，有一点同学会离你远一点吧，在他们眼中，对这种病非常恐惧。应该说（后来也）没有（说）吧。

我们那边文楼村是有名的艾滋村，恐怕有真的来自文楼的人吧，恐怕有人就会拿他开玩笑。就会说“我是文楼的，我就是艾滋病，不要和我接触”什么的。好像文楼村就是一个代名词了吧。

大家拿这个开玩笑的时候，熊长东可能就在旁边，这种时候，他只有保持沉默。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不会埋怨父母，毕竟他们是为了养家才染上了这种病。

艾滋病使家里的主要支柱倒下了，但让熊长东没有想到的是，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2003年，熊长东父亲的病刚刚有所好转，另一场灾难也接踵而至，这场灾难使一家人几近绝望。

一家人艰难度日

熊长东：2003年，村里出现了不少艾滋病患者，因为在卖血的热潮中，我哥也卖过不少，他去医院化验了一下，（他）也是艾滋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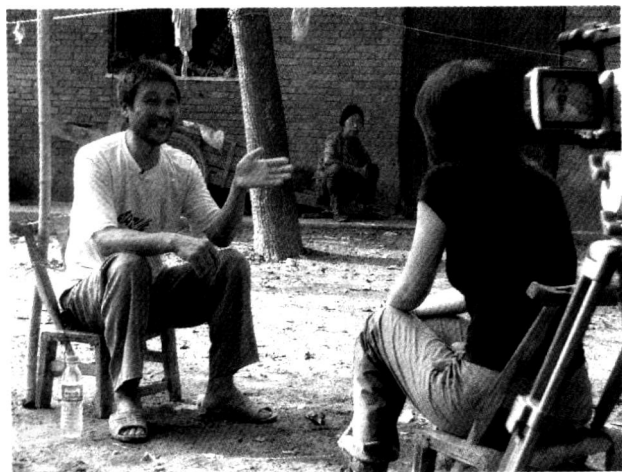
患者。那个冬天，我哥因肺部感染，不停地咳嗽，又引发了肺炎，由于家中没钱，拿一些药苦苦支撑着，实在撑不下去了，才让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幸亏抢救及时，才过得去那个年。爸爸也因操劳过度，又犯了病。家里便再也没有平静，整天不停地针与药，满屋子冲人的药味与药瓶，越堆越多。

熊父：我身体刚好转一点，去年一种了麦，我那个大儿子就躺下了，也卧床不起，肺部感染，严重得很。最后没办法了，我给他弄到医院住了半个月，到处借钱，这边他娘早上起来就跑去借钱，我那边手续办了，这帮人用车拉着，赶紧进院，挂上氧气、吊针。

在这个家庭里，两个顶梁柱先后倒下了。这是家里的两个重要劳动力，其他人没有经济收入，经济来源一下子就断了。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需要钱——特别这个病更是需要花钱。两个病人给家里带来了两重巨大的压力——思想压力和经济压力。这种压力

令人窒息，令人绝望。

当哥哥半夜发烧的时候，就叫母亲起来给他打吊针，人人都知道艾滋病是有传染性的，所



接受采访的父亲

以通常都是妈妈为儿子扎针。作为一个农家妇女，她也为了家人学起了护士的手艺。

陈晓楠：在走进这个以艾滋病命名的村子之前，无论如何我们也无法具体地想象那里究竟会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做好了心理准备去面对任何压抑的、残酷的、甚至是血淋淋的真相，但是到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村子迎接我们的是两个字：平静。这里出奇的平静，和其他的村庄相比，似乎没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错落有致的院落，一样的三一群两一伙在街上聊天的村民，看见我们的时候，连那种好奇和害羞也都是一样。但是，随即这里的人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村子里几乎每家都有艾滋病人，每年都有几个人因此而死亡。我想，可能或许是因为大家拥有共同的命运，而且不得不接受，久而久之就习以为常，或许是因为艾滋病本身就有很长的潜伏期，所以如果不发病的话，也会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总之，这个村子表面上看上去一切如常，但是我知道那种种的不一样，藏在每一个人心里很深的地方。

熊长东说，不管家里多么艰难，父母都坚持让三兄弟中唯一考上高中的他继续学业，为了他上学，父亲的病稍有好转就下地帮母亲干点力所能及的活。那时，政府每月发给每个艾滋病人 100 多元的特制票券，艾滋病人可以用票券到医院看病用药，最难的时候，父亲常偷偷地把票券换成现钱，一个人给在城里读书的他送去。熊长东说父亲送钱的情形，令他一生难忘。

熊长东：有段（时间）我真的不想上（学），上面发的那种纸币，父亲就舍不得花，要供我上学。他有时候看病，拿到这种钱会换成真钱。有时间（他）就给我送去，真的，当时我真的悲伤极了。有

时间感觉到，花的（每一分钱）可能就是我爸的救命钱吧。

陈晓楠：你有没有跟你爸爸提出过，你不再上这学了？

熊长东：我不敢说。

陈晓楠：不敢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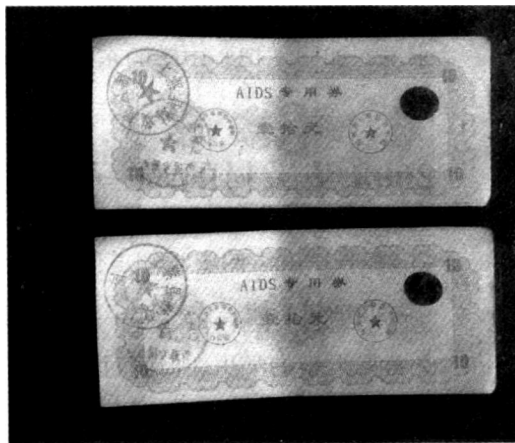
熊长东：嗯。

陈晓楠：为什么？

熊长东：毕竟我是我们家中唯一的希望吧，如果我不上的话，我不知道我爸会怎么想，他肯定很失望。我爸他挂着（吊）针的时候，他还在劝我好好上学呢。

陈晓楠：在最难过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因为儿子还是高中，要花好多钱，我听说一年要 3000 块钱，对你们那会儿到处去捱摸药费，借药费，那是很大的负担。有没有想过不让他上这个学？暂时不让他上这个学？哪怕是……

熊父：那个时候我可没这个想法。因为我再困难的时候，我想的就是那两个孩子上学，我的指导思想就是想让小孩多学点知识，多学点文化，不管是在农村也好，你就在其他各个地方也好，你就出去打工也好，你还是（要）多学点文化，多学点知识，这样比较好。就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也没想到让他弃学。我在有病最严重的时候，我都鼓励他“你别认为我有病，你就不好好上，你就



政府发放给艾滋病人治疗用的专用券

想辍学，我再困难，你最好坚持”。我跟其他人想法不一样。

父亲靠换少量的特制票券，比如用 100块钱券换二三十块现钱来给儿子省出点高中学费。

此外，熊长东的学费基本上就是向亲戚、邻里东拼西凑地借，再加上家里卖粮、养猪、养鸡卖的钱而凑齐。

熊长东把家里的困境深深埋藏在心里，小心谨慎地不让老师和同学知道，因为他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同情或异样的眼光。但是有一次，家里实在凑不足新学年的学费了，学费拖了几个星期都没有交。无奈之下，熊长东给自己的班主任写了一封长信，第一次向外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秘密。

开学之后 班主任马上找到他 班主任挺理解他的 劝慰他：“其他的你不用管了，好好学你的习吧，坚决走出这个村子，走出你们那一片，以后都会好的。”

对于熊长东来说，这是第一次对外人谈起这个话题，这对于他来说，如同“把心中憋的东西释放出来了”。

2003 艾滋村的唯一大学生

熊长东就读的中学知道他家里的境况后，免除了他的学杂费。

2003年，熊长东考取了河南农业大学，成为当年熊桥村唯一一个考取大学的学生。但面对几千元的学费，看着一无所有的家，看着正在发病躺在床上的父亲和大哥，熊长东最终无奈地选择了放弃，

一个人偷偷跑到了省城打工。两个月后，熊长东的父亲打听到儿子在省城的地址，写信给熊长东，坚持让他回家。

熊长东的父亲是决计不让他失学的，是绝对不会让他就此出去打工的。父亲在身体如此不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决心呢？面对这个疑问，熊长东说：“毕竟我是我们家的希望，如果我辍学的话，那恐怕我们这个家以后很难改变这个穷家的命运了，所以我如果继续上学，说不定那就是一次转变的机会吧。”

陈晓楠：所以你肩负着一个任务——是改变你们这个家的命运？

熊长东：嗯，可以这样说吧。

陈晓楠：你自己会时时刻刻意识到这种责任吗？

熊长东：在心里始终装着。

熊长东重新回到高中复读，他拼命地读书，决心第二年考取重点大学，走出去，走出村庄，走出这片土地，去完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

2004年6月，熊长东果然不辱家庭使命，第二次参加高考，考取哈尔滨商业大学土木专业。

像他这样，一个来自艾滋病家庭的学生考上大学，在他们这个村子是唯一的。在他们村读高中的学生已经不多，到他考上大学时，这个村几十年来走出的大学生也只有三四个。

熊长东的父亲别提多高兴了，他认为，家里几辈子也没上过大学，儿子考上了。



他第二次得到了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入学通知书

陈晓楠：你觉得他上大学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吗？

熊父：改变不了。这个东西也并不一定是考上大学就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农村有句土话“能自己扒顿饭碗、弄碗饭吃，这就行了”。

陈晓楠：现在这个学费，因为通知书上都写着呢，学费你们怎么打算呢？

熊父：学费想办法给他借啊。俺这个庄，基本上我都连票券还有现钱刨了50%，（也）借票券。借遍了。你现在真凑不齐，还得想办法借。真借不来，想办法贷款也得上。现在是你的义务，对不对？他只要愿意上，他考上了（就）是你的义务，你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上。

因为家里的境况，2003年熊长东没有能够上大学，他的父母一直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儿子的未来是老两口心中最大的心病。虽然家里还欠着两万多元的外债，境况比去年也并没有太大的好转，

但熊长东的父母说“这一次不管想什么办法也一定要让孩子走进大学的校门”。父母的执著让熊长东坚定了一定要走出去的决心，走出这片土地，走出“艾滋村”是他最强烈的愿望。

熊长东说，因为心理压力很大，所以这次其实考得并不理想，离他的目标武汉大学还是有一定差距，他说，可能是他太想考好了，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他一个人肩上。

其实，对于改变命运这样的说法，父子二人有着不同的定义：熊长东认为，要靠他自己来拯救全家；他父亲则坚持认为，只要能把儿子送出去，让他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就已经足矣，他并不期望熊长东能够拯救全家人，改变全家人的命运，他甚至也没有期望日后熊长东能回到这一片土地。

总之，“走出去”这三个字是一家人不断在念的咒语。不过，如果真的走出这一片地方，“来自艾滋村”也许或多或少还是在熊长东身上会留下一些什么符号。问到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愣了一下，说“其实没有好好想过”。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熊长东并不曾真正离开过这片土地，他可能也真的是无法想象外面的人会给这个村子里的人下什么样的定义。

陈晓楠：你会告诉同学们、老师们你是来自这样一个地方？来自这样一个村子吗？

熊长东：会告诉他们的，但是我们家庭的情况恐怕不会说。

陈晓楠：但是对于来自外界的人来讲，可能来自这样一个村子，来自这样一片地方，可能就会有一些人感到害怕？

熊长东：可能会有吧。但是你来自于哪儿，那是无法改变的，那

是事实。

陈晓楠：你怎么看待你生活的这一片土地？你怎么看待你生活的这个村子和这个镇子？

熊长东：毕竟在这村里生活一二十年了，还是有点感情的，但是自己理想（是）不在这个村子，一定要走出去！走出这个村子！

陈晓楠：走出去是你最大的理想？

熊长东：嗯。

陈晓楠：好多人都以自己的家乡为荣，对你来讲，会不会在这点上有特别复杂的那种心理？

熊长东：有。一般相比吧，好像自己的家乡带着一种背景吧，不能与他们的家乡相比，自己心中那份感情只能藏在心里吧。

陈晓楠：还是会有那一份感情？

熊长东：是。

陈晓楠：你不会从心里觉得这个家乡好像带给你一些负担？如果说严重一点甚至耻辱？

熊长东：没有那个感觉。一个贫穷的土地吧，如果自己有能力的話，应该能够能为家乡做点什么吧，应该来改变一点自己家乡的状况。

陈晓楠：但是你想走出去？走出去和改变自己的家乡之间是种什么的关系？

熊长东：我感觉到这并不矛盾。

陈晓楠：你最想改变的是什么？

熊长东：最想改变的可能就是家庭的情况吧。毕竟是贫穷，养了我们几辈子了，感觉到自己应该改变了。

陈晓楠：你怎么看待他们？怎么看待你父母亲这一辈人？

熊长东：对他们我不感到有什么埋怨的，他们也为我们这一代吧，做出了他们应有的、几乎也是他们所有的了，连身体、连自己的全身都可以贡献。

就在一家人想方设法为熊长东四处借钱的时候，家里修了无数次的老屋倒塌了。说起房子，熊长东的父母总是轻描淡写。跟我们谈得更多的还是熊长东的大学，似乎他们觉得现在有没有房子住并不重要，筹到钱让儿子上学，这才是家里头等的大事。熊长东的父亲笑着跟我们说，他们已经借到一千多元钱了！

房子塌的时候，正好是他们给儿子筹钱上学的时候。对于房子，他们就准备盖，也没这笔钱。他们现在在村里邻居那儿住。这个邻居去外面打工了。尽管不是自己的家，他们也不知会住多久。

现在，儿子在上大学期间，盖起这房子的希望更加渺茫。

面对儿子上了大学和老房塌了这两件事，他们倍感矛盾……



熊长东父亲为儿子骄傲的笑